

讲武之礼：明代大阅再探

马季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大阅是中国古代帝王操练、检阅军队的一项军事礼仪,在国家政治、军事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立足于具体的时空背景,对明代大阅特征进行考察,以求厘清明人对“大阅”的认知情况,并以此重新甄别明代大阅的形态、文本与实践的演变,以及在明代军、政中,大阅活动的作用、历史意义等。通过研究可知,明代大阅在文本上长期阙如,至隆庆时,礼臣远稽古礼,结合当时实际而制定。洪武、永乐时,大阅活动主要在战争过程中举行,军事性突出,然已出现“行礼”的自觉;宣德时,出现巡边阅视,其功能表现为一种武力威慑;正统、天顺、成化时,近郊西苑阅武发展,其规模与隆重程度减弱,振兴军事的功能有限;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九十余年,大阅陷入停滞;隆庆、万历时,大阅上升至制度层面,走向鼎盛。大阅在明代被视为一种军事活动而非礼仪,但其“行礼”的色彩却不断增加,且与军、政息息相关,至万历九年,明廷举行最后一次大阅,大阅伴随明中后期改革的终止而不再举行。

关键词:大阅;《明集礼》;军事振兴;武力威慑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4)02-0254-10

大阅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活动,展现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和进行战争的意志,在国家政治、军事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明初大阅活动虽多有举行,但其文本的发展却陷入停滞。隆庆时大阅文本化、制度化,至万历时载入《会典》,大阅终发展为一代军事大典。其文本的演变背后,透露出丰富的政治与文化意蕴。此外,大阅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与军、政的关系紧密,其不论是否按照礼仪的文本举行,皆含有具体而特殊的意义。因而,探讨大阅活动在明代的具体面貌、功能与意义,对于研究明代的礼制与军、政,仍然是有必要的。

目前关于明代大阅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隆庆朝,王天有《试论穆宗大阅与俺答封贡》认为,穆宗大阅是明朝振兴军事的契机,其整顿了京营,振奋了军心、民心,标志着明朝军事积弱局面的扭转^[1]。王进《明代大阅初探》以隆庆大阅为中心,考察了明代大阅活动的举行状况,指出大阅兼有军事和礼仪两种性质,是特定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产物^[2]。高寿仙《“大阅”之礼的面子与里子:作为改革产物的明代隆万大阅》强调,大阅是隆万改革中“整饬武备”的措施,发挥了整顿京营、威慑外敌的作用,其始于改革的开始,终于改革的结束^[3]。美国学者鲁大维对大阅的论述追溯至嘉靖朝对是否恢复大阅礼的争议,延及隆万时期大阅礼的实践与消失,指出大阅等尚武活动是皇帝、官员、太监等追求个人与王朝利益的舞台^[4]。此外,还有一些礼制通论性著作对明代大阅礼有所论及^[5-7]。

以上论著,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明代大阅的流程、功能与终结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它们忽视了对大阅进行文本层面的分析,对大阅发展演变的论述也不够全面,在大阅与明代

作者简介:马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代北京佛教研究”(22AZJ002),项目负责人:何孝荣。

军、政关系的研究上亦不够深入。另外在对大阅礼的认定方面,也缺乏确切的标准。因此,本文立足于具体的时空背景,对明代大阅进行考察,以求厘清明人对“大阅”的认知,并以此重新甄别明代大阅的形态、文本与实践的演变,以及在明代军、政中,大阅活动的作用、历史意义等。

一、明代大阅文本的形成

大阅礼最早在西周时即有了较为详细的程式,如《周礼》载:“仲冬,教大阅,司马主其礼。”^{[8]卷27,春官宗伯·第三}又《礼记》孟冬“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郑注:“为仲冬大阅习之。”^{[9]卷17,月令·第六之三}东汉时,立秋日行“獬刘”礼,“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獬刘”,以“扬威武”^{[10]卷95,礼仪志中}。唐朝时,《大唐开元礼》有“皇帝讲武”篇,皇帝亲临参加大阅。伴随着同一地点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大阅礼进一步发展,其内容和程式更加具体规范,渐渐趋于制度化^{[11]卷85,皇帝讲武}。宋代的讲武、大阅礼沿袭唐制,如《宋史·礼志》称:“阅武,仍前代制。”^{[12]卷121,礼志}另据学者考证,《大唐开元礼》的“皇帝讲武”篇依据经书“大阅”而制定,北宋的“讲武礼”沿袭唐礼,亦为“大阅”^[13],古“讲武礼”即为“大阅”。元朝大阅礼文无考,据笔者考证,《元史》志书、《元典章》均未见有皇帝大阅的记载,正如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载:“胡元典故阙焉未备。”^{[14]卷首,凡例}

明代前期制定军礼,但并无大阅礼。史称,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朱元璋诏定军礼。因前元军礼仪文阙如,中书省臣会同儒臣,参考周制,借鉴唐、宋典章,定军礼为“亲征”“遣将”诸仪,却无大阅礼^{[15]卷33,洪武元年闰七月庚戌}。洪武二年,朱元璋又诏命儒臣修撰礼书,次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大明集礼》以“五礼”为体例,“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16]卷47,礼一}。翻阅《大明集礼》“军礼”篇目,仅有“亲征”“遣将”“大射”等三项,亦无“大阅”篇目^{[17]卷33-35,军礼}。其时,“宋濂方家居,诸仪率多陶安裁定。大祀礼专用安议,其余参汇诸说,从其所长。……军礼用陶凯,皆能援据经义,酌古准今”^{[18]卷6,礼一}。可知明初礼仪多为陶安所裁定,其中军礼由陶凯所议定。总之,明初虽制礼定律,但并未制定大阅礼。

明朝有关大阅礼的文本长期阙如,“列庙以来,即不废简阅之举,顾未常以大阅著为令。独庄皇帝锐意飭武,准自隆庆三年为始,于季冬农隙之候圣驾亲临阅视”^{[19]卷63,兵部十二}。说明隆庆三年(1569)以前大阅礼无固定的仪节,隆庆大阅活动的实践,推动了大阅礼的文本化、制度化。隆庆大阅,兵部尚书霍冀“主持其事”,其从隆庆二年即开始组织制定、编纂大阅礼的程序与仪节,遂成书《大阅录》^[20],该书是最早记录隆庆大阅礼的文本,成书时间可能在隆庆三年五月至四年之间^{[2]2-3}。而关于大阅礼的具体制定,如时参与制礼的兵科都给事中张卤言:“恭逢圣驾大阅,臣读《大明会典》,见其营操整点之文,而大阅独不列于夏官。读《大明集礼》,见其亲征大射之文俱备,而大阅又不见于军礼。因祖宗旷久未行,故典制阙文未载。”^{[20]第16册下,大阅录}由此可知,隆庆时《(正德)明会典》《明集礼》均未载大阅礼仪文,又“旷久未行”。鉴于此,礼臣在制定大阅礼时“略参古制,兼酌时宜”^{[21]卷36,隆庆三年八月甲辰}。正如穆宗敕曰:“兹朕远稽古典,近遵祖制,采纳辅臣之言,以今年季秋亲行大阅之礼。”^{[21]卷37,隆庆三年九月甲午}

《大阅录》是明代大阅礼文本的开端,后来的官书、礼典中有关大阅礼的记载与《大阅录》相比,在实质上并未有变化。如《明穆宗实录》,于万历二年(1574)撰修完成,其中关于隆庆大阅礼的记载基本与《大阅录》一致^{[21]卷36,隆庆三年八月甲辰}。万历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推行变法,明朝出现中兴的局面。所谓“盛世修典”,四年六月,张居正奏曰:“以定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典则。”^{[22]卷5,请重修《大明会典》疏}请重修《大明会典》。该议得到神宗准允,“命大学士张居正等充纂修《大明会典》总裁”^{[23]卷51,万历四年六月癸未}。自万历四年七月至十五年,历经十一年,万历《大明会典》修成,其中大阅礼被收录至《兵志篇》,自此大阅制度才被提升到作为一项军事大典的地位。

国初车驾亲征,则随地阅武。宣德、正统间,或阅于近郊、于西苑,然不著令。隆庆三年,因辅臣建议,于三大营教场举行。万历九年,上亲大阅,一如隆庆中故事,今具列焉。^[24]卷135,兵部

上述记载再次说明隆庆三年大阅活动的实践推动了大阅礼的文本化。此外,还有与万历《大明会典》几乎同时修撰完成的王圻《续文献通考》,在时间上上接宋嘉定,下迄明万历,如其凡例云:“金匱石室之藏虽或不能尽睹,余尝从台臣之后,凡六曹文牒暨诸先贤奏牍,咸口诵手录,得什一于千百,遂即贵与款以类附入。”^[14]卷首,凡例 王圻《续文献通考》采纳明朝“六曹文牒”“先贤奏牍”等官方史料,在《文献通考》拟定的体例上,有因有创,以当时人记述当时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25]。因而《续文献通考》中,隆庆三年大阅仪文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可以保证,但对照《大阅录》《明穆宗实录》中的记载,大阅礼仪节亦无多大变化。另泰昌时期,俞汝楫编修《礼部志稿》,录有万历九年大阅仪文,也是在隆庆三年大阅礼仪的基础上,“而加详也”^[26]卷95,旷典备考。

可见,明代“大阅礼”的文本生成,霍冀主持编纂的《大阅录》发其端,由奏请举行“大阅”的张居正最终裁定,载入《会典》,自此大阅礼作为一项军事大典,上升至文本、制度层面。后续诸多史书,如《明穆宗实录》、王圻《续文献通考》、俞汝楫《礼部志稿》等对大阅仪节的记载,皆依循前者,无实质性变化。总之,明中期大阅礼的文本化、制度化,是在元朝礼制百年阙如后,明廷远稽古礼,适时而制,也是明朝建国两百年以来对大阅礼在文本上的总结。

二、明代前期的大阅

前文已指出,明代有关大阅礼的文本长期阙如,直到隆庆时期才文本化。那么,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明前期大阅活动表现出了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一)洪武、永乐时期的军事性大阅

明初随地阅武,大阅无固定的场所与仪节的安排,据《五礼通考》记载:

洪武之际,国事草创,其练兵也,皆因出师征讨,而无事之时,未有定式。永乐有定式矣,然天子自行大阅者,亦为命将出师,或亲征行之也,仁、宣之世亦然。^[27]卷240,军礼八

洪武、永乐时期的大阅活动相当频繁。朱元璋“武定天下”,早在明朝建国前,在军事战争中,即频举大阅,如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十二月,平陈友谅,朱元璋阅武于鸡笼山^[15]卷13,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午。至正二十五年正月,平吴后,朱元璋亲阅将士^[15]卷16,吴元年正月乙酉,以及两年后的吴元年(1367)阅武^[15]卷25,吴元年九月戊子。此时的大阅应由军方组织进行,参与者主要为临军征战的将士,且一切以在军事战争中获取胜利为最终目的,大阅活动为纯粹性的军事检阅。

明朝建国后,建立卫所兵制,在“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洪武十三年(1380)废丞相,又分大都督府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16]卷89,兵志一。此时大阅活动相较于建国前,军事性质仍凸显,但已开始出现行礼自觉。如洪武五年明廷对北元用兵失败,北元趁机反攻。为此,朱元璋调整北边军事政策,由主动出击转为积极守御,调回北征将士至山西、北平等地备边。次年三月,朱元璋阅武教场,随后命徐达、李文忠等统诸将校,“修理城池,练兵训将,以备边陲”^[15]卷78,洪武六年正月壬子。此次大阅出现在抗击北元的军事用兵前,很明显是在被动情况下的大阅活动,目的是“以示威武”,体现了大阅的军事功能。

其后,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明朝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对西北甘、宁地区的经营,成功压制住了北元的右翼。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解决了对北元作战的后顾之忧。洪武八年,北元将领扩廓帖木儿去世,北元军事实力进一步削弱;三年后,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死,其弟脱古思帖木儿继位,“孱弱不能制”,诸王、大臣“各相猜

忌”^[15]卷168,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北元的统治加速衰微。显然,明朝征伐辽东的时机成熟。于是,洪武二十年二月,朱元璋命冯胜、傅友德等统兵二十万征元将纳哈出。出师前,朱元璋“阅武于午门外”^[15]卷180,洪武二十年二月壬午,大阅活动即发生在明军大举征伐辽东前,以示军事征伐的实力与意志。

永乐时,成祖朱棣五征漠北,大阅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更为活跃的时期。如成祖“定天下善用兵……八年征胡大阅,后四年复大阅已,每出师则随阅焉”^[28]卷中,大阅。此时,北元蒙古部落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其中鞑靼实力最强,且与瓦剌不断相互仇杀。明朝对蒙古采取分化瓦解,维持均势,恩威并施的政策。永乐四年(1406),鞑靼发生内乱,大将阿鲁台杀鬼力赤,迎元宗室本雅失里为可汗。至此,鞑靼几乎断绝与明朝的往来,且不断南下侵扰明朝边境。永乐七年,成祖命丘福率军北征,遭受大败。次年二月,成祖亲率大军五十万北征蒙古,大军驻蹕兴和,大阅。次日,又大阅;三月,驻蹕鸣銮,再次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铜震”^[29]卷102,永乐八年三月乙亥。成祖亲征,途中三次大阅将士,军容盛大,其目的不限于训练将士,彰显军威,在战争的状态下,它更意味着从和平进入到战争的一种模拟。此次,明军重创阿鲁台,大大削弱了鞑靼的势力,明廷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观察永乐朝之后几次大阅。鞑靼被明军重创后,瓦剌部趁势崛起,再次打破蒙古各部之间的势力平衡。永乐十一年,瓦剌首领马哈木扣留明朝使臣,进兵胘胸河,挑战明朝的权威。次年二月,成祖率师亲征瓦剌,大阅;四月,驻蹕兴和,再次大阅。此两次大阅,一次在出征前,随后即进行军事安排,命柳升、郑亨等领大营及中军;一次在驻蹕兴和时,因前闻“马哈木今遣乞塔歹率骑卒至兴和,侦朝廷动静”^[29]卷148,永乐十二年二月庚戌。阅后“颁军中赏罚号令”,又敕大营及五军诸将“行师之要”,需“严军令”,“明功赏”^[29]卷150,永乐十二年四月乙酉、永乐十二年四月庚戌。成祖第一次大阅,穿插命将的军事安排,并严明赏罚号令;第二次大阅选择在瓦剌骑兵侦测地兴和,以示威慑。大阅活动明显表现为成祖军事战略中的一环,发挥鼓励将士、威慑外敌的功能。此次亲征也是成功的,明军击败马哈木,北部边境又回到了和平的局面。

再看永乐二十年以后的亲征大阅。瓦剌部落遭受重创后,鞑靼部又再次发展壮大,首领阿鲁台数次率众扰边。是年三月,成祖率师北征。四月,驻蹕云州,阅兵。他对侍臣说:“今从征之士,皆各处简择来者,若不阅习,何以御敌?”^[29]卷248,永乐二十年四月乙卯。五月,驻蹕隰宁,复大阅。次西凉亭,再次大阅。此次亲征,成祖频繁地举行大阅,是为了让“各处简择来者”“习熟行阵”,提高作战能力。是役,阿鲁台听闻成祖亲征,遁走避战。后阿鲁台再次扰边。永乐二十一年七月,成祖率大军进行第四次亲征。八月,次宣府,成祖宴劳大营五军诸将,大阅“时积阴初霁,诸军部伍整肃,旗旄戈甲,精彩鲜丽”。成祖大悦曰:“军次固盛,然又将谋、士有勇,小大协心,乃克成功。”^[29]卷262,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乙酉。盛大的军容,参阅将士们精彩的演武,使成祖对战争的取胜极为自信,可见大阅壮威的军事功能。此次,鞑靼阿鲁台,先已被“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余孽奔溃逃命”^[29]卷264,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庚午,已无力抗拒明军。明军无所斩获,不久班师回朝。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大同、开平守将并奏“虏寇阿鲁台所部侵掠边境”,成祖在与廷臣商议后,决议再次亲征漠北^[29]卷267,永乐二十二年正月甲申。三月一日,在出兵前夕,成祖大阅军士,并进行了相应的军事安排,“命安远侯柳升领中军,遂安伯陈英副之……泰顺伯吴克忠、都督李谦等各领兵从”^[29]卷269,永乐二十二年三月戊寅。永乐北征的数次大阅,皆是在实际的军事战争中,大阅活动为用兵中的一环,可以说是战争状态下的一种模拟作战。

纵观洪武、永乐时期的大阅,其与具体的军事活动皆有密切的联系,表现为以战争前奏的形式出现在军事活动中。大阅礼的基本程序包含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大幅度调动与组织动员,虽非直接的、实际意义上的武力使用,但直接表示了使用武力的决心。正如相关研究表明,大阅活动

中,军队演练军事技能,军容盛壮、进退有法,都是实战能力的一种展示^[13]。明显,洪武、永乐时期的军事大阅具有实战练兵、武力威慑的功能。

(二)宣德时军事性大阅的转向

洪熙时期,未有举行大阅的记载。宣德时,偃武修文,放弃了洪武、永乐时对蒙古大规模军事进攻战略,代替的是巡边阅武等威慑活动。如宣德三年(1428)八月,宣宗首次巡边,曰:“朕为民故,特因田猎阅武,遂飭边备耳。”^{[30]卷46,宣德三年八月丁酉}表示“阅武”在于保边为民,整饬边备,扈从巡边的文臣杨荣,有诗曰:“圣主戎衣振武功,六军意气总骁雄。”^{[31]卷1,阅武}

宣德四年十月,宣宗“将阅武郊外,命各都督府整兵从卫,文武衙门各以堂上官一员、属官一员扈从”^{[30]卷59,宣德四年十月癸巳}。宣德时期,大阅活动缩减,洪武、永乐时期的随战而阅不复再见。此次宣宗阅武,一方面大阅的程序、军队变阵及礼官事先拟定仪注等未见记载,或许是对洪武、永乐时期军事性大阅的一种因循;另一方面,由五军都督府统卫所兵参与,各衙门均遣官员扈从参阅,大阅仪式化的色彩复苏。

宣德五年冬十月,宣宗第二次巡边,阅视宣府,“亲历城堡营垒,遍阅士马铠甲、旗帜,皆称上意”^{[30]卷71,宣德五年十月丙戌}。宣德九年九月,宣宗最后一次巡边,驻蹕洗马岭,同样“亲历城堡,阅兵备”^{[30]卷112,宣德九年九月丁酉}。时徐有贞作《车驾巡边颂》曰:

天威震耀,疆圉肃清,士气振作,民心辑宁。边人恐惧,潜形灭迹……千乘万骑,巡彼朔方……天威孔肃,兵气载扬。兵气之扬,如雷如霆,莫不慑服,莫不震惊。遐哉荒服,咸载声灵,烽燧以息,边塞永清。^{[32]卷2,登瀛稿}

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仍可见宣宗巡边规模之宏大与军容之盛以及对边陲的震慑。通观宣宗三次巡边阅武,与洪武、永乐时的军事性大阅相比,可谓是一种军事降级,而其目的在于保民防塞,整饬武备,发挥对北部边疆军事性威慑的功能。此外,宣宗时的巡边阅武主要在和平时期,与洪武、永乐时主动出击而举行的大阅相比,更需要以礼的规范来显示军容的威仪。

三、明代中期的大阅

明代中期,伴随国家军事的衰落,大阅活动进一步消歇,但行礼的色彩却不断增加,主要表现在近郊西苑阅武的发展。

正统时出现西苑阅武活动,如正统十三年(1448),英宗“亲幸近郊以大阅师旅”^{[33]卷171,正统十三年十月乙卯},时编修倪谦随侍,诗《侍阅军容》云:“圣皇阅武禁门西,翠葆葳蕤簇仗齐……材官结队皆黑虎,宝马成群尽馱駉。”^{[34]卷7,扈从谒陵十咏}“土木之变”后,明军遭受重创,“京军没几尽”^{[16]卷65,兵一}。由此,明廷开始重视整顿军事,“盖因土木之变,稍以兵事为重也”^{[35]卷130,兵考}。如天顺四年(1460)十月,阅京营将领骑射于西苑,时英宗对李贤曰:“为国莫重于武备,练武莫先于骑射。”^{[33]卷320,天顺四年十月甲子}关于此次英宗阅京营将领骑射的记载如下:

时五军、三千、神机三营,自总兵而下,坐营、把总、管操官亦千数百人,悉召入西苑,与御马监勇士头目,俱驰马试箭,阅其优劣而品第之。^{[33]卷320,天顺四年十月甲子}

可知参阅人员主要为京军三大营将士,阅视的项目只有单一的“骑射”,人数仅以千计,更无变阵、挑战等事,与洪武、永乐时期动辄数十万的随军大阅相比,其规模与隆重程度大为递减。但阅京营勇士“驰马试箭”,定其品第,却颇具军事表演的色彩,其行礼的自觉增强。是年,英宗又阅随操武臣骑射于西苑^{[33]卷321,天顺四年十一月丁酉}。美国学者鲁大维研究认为,英宗的草原经历,使他认识到了骑射田猎与军事实力、政治声望以及帝王权势的关系。重田猎又昭示了其永乐、宣德二帝的正统继承人,进而巩固了其在朝廷中的权力^[4]。天顺时期的阅武,带有振兴武备、宣示正统、巩

固统治的政治内涵。

成化时期,宪宗在西苑对团营进行检阅。团营即京营的前身。景泰三年(1452),于谦议立团营,即从旧三大营中选健壮士卒团练。天顺元年(1457)罢团营,成化元年(1465),“复立团营”^{[16]卷13,宪宗本纪一}。二月,检阅团营将士。宪宗敕曰:“悉取所选二等壮勇军士籍报,以凭简阅。”^{[36]卷14,成化元年二月乙巳}成化时期西苑阅武团营,其程序的安排依天顺时,如“天顺时,每亲阅射于西苑。成化九年亦仿行之”^{[35]卷130,兵考}。成化九年四月,宪宗“以武备懈弛,乃御西苑,命将官骑射”。阅视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宪宗怒敕曰:“中三矢者仅四人,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余皆全不能中,间又有止发一二矢者,甚至驰骤失节,不能开弓发矢,及堕弓于地者。”^{[36]卷115,成化九年四月壬午}时因武臣差遣在外及“新授职不及试者”,十一月,宪宗再次阅骑射于西苑,“把总、指挥安通等九人以射八中,及定襄伯郭嵩、安乡伯张宁、富阳伯李輿、成安伯郭鏞,以不任事俱罢之”^{[36]卷122,成化九年十一月丁酉},结果仍不如人意,大阅活动暴露了成化时期国家军事的衰败。又成化十九年八月,宪宗命太监怀恩、户部尚书余子俊等阅视团营官军^{[36]卷243,成化十九年八月乙亥}。明中期的近郊西苑大阅,是一种被动的军事行为,其特点表现为小规模、不定时,说明了此时明廷对大阅的轻视,根本难以起到训练将士、振兴军事的目的,大阅发挥的政治、军事功能有限。

纵观天顺、成化时期的近郊西苑阅武,随着明朝军事的衰败,其规模与隆重程度大为减弱,但皇帝亲临参阅,京营军官轮番骑射,具有相当的“表演”性质,大阅的礼仪特性进一步凸显。

四、明代后期的大阅

弘治、正德、嘉靖三朝,随着明朝军事的进一步积弱,大阅活动进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九十余年未再举行。至隆庆三年,大阅活动再兴重举。

(一)隆庆时大阅的再兴

隆庆初,穆宗欣然求治,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一批干练能臣辅政,拉开了隆庆革新的序幕。面对严峻的边关形势及明廷军事衰败的困境,隆庆君臣将整饬武备、振兴军事放在了革新的头等位置。如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上奏疏言:“臣惟当今之事,其可其虑者,莫重于边防。”建议“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惟圣驾亲临校阅”^{[21]卷23,隆庆二年八月丙午}。正式提出重举大阅的主张。张居正认为再举大阅,可以整饬京营,“试将官之能否”,裁汰老弱,申明朝廷重视武事的决心,上行下效,扭转军事衰败局面,“减转弱为强之一机也”^{[21]卷23,隆庆二年八月丙午}。该议也得到了兵部尚书霍冀的支持,如其言:“当戎务废弛之秋,正四方改观易听之会。……恭请圣驾亲临校阅。”^{[21]卷24,隆庆二年九月戊辰}最终穆宗表示准行。隆庆三年八月,大阅活动再次出现在京营教场。如《明史·礼志十一》载:

前期一日……司设监设御幄于将台上,总协戎政大臣、巡视科道督率将领军兵预肃教场。至日,早,遣官于教场祭旗纛之神。^①

是日,免朝。……皇帝常服乘辇由长安左门出,官军导从,钲鼓振作。出安定门,至阅武门外。……兵部官奏请大阅。……兵部尚书请阅阵,举炮三。马步官军演阵,如常法。演毕,复吹号笛,麾黄旗,将士俱回营。

少顷,兵部尚书请阅射。总协戎政官以下及听射公、侯、驸马、伯、锦衣卫等官,俱于台下较射。马三矢,步六矢,中的者鸣鼓以报,御史、兵部官监视纪录。把总以下及家丁、军士射,以府部大臣并御史、兵部官于东西厅较阅。枪刀火器等艺,听总协戎政官量取一队,于御前呈验。

^① 省略部分为任命各环节负责人的记载。

兵部尚书奏大阅毕……礼毕，驾回行宫，少憩，扈从等官趋至门内立。……百官不扈从者，各吉服于承天门外桥南序立。恭送，驾还，迎如之。

次日，总协戎政官以下表谢，百官侍班行称贺礼，如常仪。兵部以将士优劣及中箭多寡、教练等第奏闻。

越二日，皇帝御皇极门，赐敕勉励将士。……是日，即行赏赉并戒罚有差。次日，总协戎政官率将佐复谢恩。诏如议行。驾还，乐奏《武成之曲》。^[16]卷57，礼志十一

隆庆三年大阅有极为详细的记载，其中核心部分是马、步军演阵，公、侯、驸马、伯、锦衣卫等官进行较射以及枪刀火器等艺的展示，程式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可谓是一种合乎典礼的特殊表演。其中对时刻、服饰、方位与次序的描述则反映了大阅仪注的特色，也可以看出此次大阅基本是按照事先拟定的仪注进行的。包括前期准备（布置场地+受阅部队的列阵安排）—祭旗纛—人员入场（皇帝+百官等）—阅武开始（阅阵+阅射+枪刀火器等艺呈验）—结束大阅（人员退场+后续安排）。最后，还配乐《武成之曲》：“吾皇阅武成，简戎旅，壮帝京。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冑明。威灵广播，蛮夷震惊，稽首颂升平，四海澄清。”^[21]卷37，隆庆三年九月辛卯

总体上，隆庆三年大阅展现出充分的行礼自觉，是军队的一种特殊战斗表演，是和平时期对战争的一种模拟，可以说是明代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大阅礼”。此次大阅盛况空前，如时大学士张居正盛赞曰：“选卒十二万，戈铤连云，旌旗耀日。天子坐武帐中，观诸将为偃月五花之阵。已，乃阅骑射，简车徒。礼毕，三军之士皆呼万岁，欢声如雷。都城远近，观者如堵。军容之盛，近代罕见。”^[22]下册，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事实证明隆庆大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甄别将官，考校军士，以为黜陟赏罚”^[24]卷135，兵部。京营得以汰弱补强，实力大增，同时大阅也昭示了明廷重振军事的决心，振奋人心。张居正有诗曰：“我皇中兴初复古，四海时平犹整旅……军威万里播幽朔，胡天已见旄头落。”^[22]卷2，送敕使阅武 将隆庆大阅视为“中兴”之举。

（二）万历时大阅的鼎盛与终结

万历九年三月，明朝举行了最后一次大阅。此时由首辅张居正主持的变法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边陲局势安定，明朝国力大为增强。正如时人评论：“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16]卷222，张学颜传 万历大阅，明显也是在张居正的倡导下举行的。时人朱国祯云：“国朝圣驾大阅，惟隆庆三年一举，其说发于张太岳……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37]卷1，大阅

是日，明神宗“圣驾幸阅武场，亲阅营阵，并校诸将佐马步射”^[38]。明神宗亲临，阅营阵、骑射，与隆庆大阅一样，气势恢宏。时居官京城之王祖嫡有诗赞云：“大简师徒翠华出，九游七萃列辕门。”^[39]卷3，大阅歌 事后，张居正进献《大阅图》，并呈疏曰：“（大阅）诚修内攘外之鸿猷，致治保邦之长策也。”^[22]卷11，进大阅图颂卷疏 时作为张居正改革重要助手的吏部侍郎申时行也描述此次大阅“旌旗蔽天，戈铤耀日”，并认为大阅“习威仪”“数军实”，有振奋人心的作用，颂扬其为“盛王伟略”“旷古宏猷”^[40]卷7，圣驾大阅表。张居正、申时行作为明中后期大改革的主要人物，对军事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大阅如此称颂有加，不惟是对其丰功伟业的盛大展示^[3]。大阅礼在明中后期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走向鼎盛。

此次大阅仪节与行礼程序，“如隆庆故事”。隆庆时期阅武，对马、步军演阵法的记载语焉不详，而万历大阅则有详细的描述可为补充，如：

先演五花营阵，戎政官引号头官执牌跪奏，演五花营阵；次演四方平定营阵……演营毕，将台上红旗台前起掣，人、马、炮三营中应开营，炮三官军调哨，各回军营，将台上又吹号笛、麾黄旗，各营钲鼓齐振。俟将士回营毕，台上又举蓝旗，鸣金止鼓。戎政官引号头官执牌跪奏，演营阵毕。^[26]卷95，旷典备考

戎政官等跪奏演阵,从五花营阵到四方平定营阵的变化,红旗、蓝旗的变换,调哨、钲鼓、鸣金等一系列程序,伴随着的是马、步军对实战的一种模拟,军队按照规定在“表演”作战,凸显了大阅的礼仪性,颇合礼典的“表演”“象征”特性^[41]。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次年,神宗下诏追夺张居正的所有官阶,发起倒张运动,大阅活动作为张居正军事改革的重要部分被废止。随后,神宗长期怠政,“廷臣渐争门户,(京营)习于偷惰,遂日废弛”^{[16]卷89,兵志一},明朝大阅礼在张居正的倡导下走向复兴与鼎盛,也由其人亡政息而骤然走向终结,终至明亡而不再举行^①。明朝军、政无可挽回地再次走向衰颓直至灭亡。

关于明代大阅的内容,据现存文献《明史》《明实录》等记载,经笔者整理,构成略如下表 1:

表 1 明代大阅简表

时间	地点	参与者	活动
洪武六年(1373)	京营教场	五军诸将	大阅
洪武二十年(1387)	皇宫午门	五军诸将	大阅
永乐八年(1410)	武营外	大营五军诸将	三次大阅
永乐十二年(1414)	兴和	大营五军诸将	二次大阅
永乐二十年(1422)	云州	大营五军诸将	三次大阅
永乐二十一年(1423)	土木	大营五军诸将	大阅
宣德四年(1429)	京郊外	大营五军诸将	大阅
正统十一年(1446)	京城近郊	京营将领	大阅
天顺四年(1460)十月	西苑	京营将领	阅骑射
天顺四年十一月	西苑	随操武臣	阅骑射
成化元年(1465)	西苑	十二团营将士	大阅
成化九年(1473)	西苑	阅武臣	二次阅骑射
隆庆三年(1569)	京营教场	三大营官军	大阅
万历九年(1581)	京营教场	三大营官军	大阅

五、结 语

本文考察了大阅礼在明代的文本生成,和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其形态、功能、意义及与军、政的关系等问题。明初制礼及修《大明集礼》,没有制定大阅礼,至隆庆大阅的实践推动了大阅礼的制定,再至万历《大明会典》,大阅礼始被收录至《兵志篇》,终成一代军事大典。其中霍冀主编的《大阅录》是明代大阅礼文本的开端,后继官书、礼典,如《明穆宗实录》、王圻《续文献通考》、俞汝楫《礼部志稿》对大阅礼的记载在实质上并未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礼典中“大阅”被列于“兵志”“兵考”“旷典”篇目而非唐宋时期的礼志类,反映了大阅在明代被视为一项军事活动而非国家的礼仪行为。直到清朝官修《明史》才将“大阅”置于“五礼”的军礼行列,被当作一项重要的军事礼仪。反过来,由于元朝军礼无考,隆庆时,礼臣远稽古礼,因时定制,明代大阅礼与唐、宋以来的讲武礼一以贯之,隆庆时大阅的文本化,也是对明朝前两百年以来大阅活动在实践方面的总结。明代大阅的发展演变,体现了元朝近百年礼制阙如后,对中华传统礼制的恢复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朝前期大阅呈现出实战性、军事性,至宣德时出现和平时期的阅武,礼仪的色彩随之渐显。朱元璋“武定天下”,在明朝建国前夕,取得军事战争的胜利为一切活动之鹄的,此间大阅的目的在于激励将士,振奋军容,是一种纯粹性的军事性检阅或阅兵。洪武时期,面对北元的强大攻势,

① 崇祯十年(1637)八月,庄烈帝车驾阅城。从《崇祯实录》《明史·礼志》等各类文献记载来看,并无集结大军,其阅视对象是守卫京师城门楼的京卫军。又如《明季北略》卷 13 记载:“上欲巡城,敕礼兵二部;核旧例,二祖至今无有也。”(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20 页。)亦未视其为大阅活动。因而本文,不将其纳入“大阅礼”的范围。

太祖增强边防,以阅武来训练与鼓舞将士,大阅初步具有出现“行礼”的性质。永乐时期,成祖五次亲征漠北,在具体的军事战争中多次展开阅武活动,旨在训练将士、威慑外敌,其实战性、军事性仍极为突出,表现为一种“战时的军礼”。如“大阅,高皇帝起兵之初随地阅武。……文皇帝从圣祖定天下,在燕邸时,时统军出塞讨虏,既即位,八年征胡大阅,后四年复大阅已,每出师则随地阅焉”^[42]卷42,兵制。宣德时,国家治理转向“文治”,大阅活动开始脱离洪武、永乐时期实战中军事阅武的性质,出现巡边阅视、近郊阅武等和平时期的阅武活动,大阅行礼的色彩开始复苏,大阅的功能体现为对边陲的一种军事威慑。以“平时的军礼”这一视角来看,大阅则表现为对王朝秩序的展示^[43]。

明朝中期军事衰颓,近郊西苑阅武得到发展,大阅的礼仪特性臻于浓厚。近郊西苑阅武相较于洪武、永乐时期的实战性、军事性大阅,其规模与隆重程度减弱,但军队依据具体的程序进行骑射演武活动,其“行礼”的色彩愈加浓厚。此间正统、天顺、成化时期,“时承平久,武备浸衰,乃阅武”^[28]卷中,大阅,大阅的功能表现为对军事的检验以及有限的振兴武备。后续弘治、正德、嘉靖时期,大阅活动长期不再举行,其文本与实践的发展陷入停滞。明朝后期隆庆朝大阅活动重兴再举,其仪节的安排繁琐、程序化,突出了礼仪的色彩。又隆庆时期,大阅活动作为对边陲军事压力的一种被动应对,较之洪武、永乐时期北伐亲征,更需要以礼的程序来规范和训练部队,如《荀子》曰:“凡礼……师旅,饰威也。”^[44]卷13,礼论篇第十九同时,在无实际军事行动的背景下,皇帝亲临校阅,军队按照仪注进行演武,展现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与战争的意志,与国家整饬武备,振兴军事的战略环环相扣。

万历九年,在张居正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明朝国势昌盛,此时大阅活动再次举行,其程式与仪节一依隆庆大阅,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军事礼仪活动,其规模达到巅峰,彰显了国家的强盛与改革的丰功伟绩。可见明朝大阅“行礼”的色彩在整体上逐渐浓厚,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但随着张居正人亡政息,作为明朝中后期军事改革重要环节的大阅礼不再举行。明朝的军、政随之再次隳颓而不可挽救,其后“法令空悬,废弛犹作”,“(京营军)上恬下熙,玩日愒月”^[19]卷63,兵部十二。至万历末年,“废坏极也”^[16]卷22,嘉宗本纪。后世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国势更是江河日下,明朝再也无力、无意举办盛大的大阅活动,大阅礼在文本上也不再发展,大阅的终结与明朝国势衰颓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 [1] 王天有. 试论穆宗大阅与俺答封贡[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92-100.
- [2] 王进. 明代大阅初探[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 [3] 高寿仙. “大阅”之礼的面子与里子:作为改革产物的明代隆万大阅[J]. 人民论坛,2015(25):78-80.
- [4] 鲁大维. 神武军容耀天威[M]. 杨柳青,康海源,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35-255.
- [5] 陈戍国. 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323-356.
- [6] 杨志刚. 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21-460.
- [7] 赵中男. 明代宫廷典制史[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465-500.
- [8] 郑玄. 周礼注疏[M]. 贾公彦,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9]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1] 萧嵩. 大唐开元礼[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12]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3] 尹承. 北宋讲武礼新探[J]. 中国史研究,2017(1):91-110.
- [14] 王圻. 续文献通考[M]. 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
- [15] 明太祖实录[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6]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7] 徐一夔. 明集礼[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50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8] 龙文彬. 明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9] 张萱. 西园闻见录[M]. 杭州:杭州古旧书店,1983.
- [20] 霍冀. 大阅录[M]//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十六册下. 北京:线装书局,2009.
- [21] 明穆宗实录[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22] 张居正. 张太岳集[M]. 张嗣修,张懋修,编撰. 北京:中国书店,2019.
- [23] 明神宗实录[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24] 申时行. 大明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5] 李峰. 王圻《续文献通考》史学成就探析[J]. 中国文化研究,2007(3):142-147.
- [26] 俞汝楫. 礼部志稿[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98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27] 秦惠田. 五礼通考[M]. 方向东,王锸,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20.
- [28] 史继偕. 皇明兵制考[M]//皇明修文备史.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册.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 [29] 明太宗实录[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30] 明宣宗实录[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31] 杨荣. 杨文敏公集[M]//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9册. 合肥:黄山书社,2013.
- [32] 徐有贞. 武功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33] 明英宗实录[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34] 倪谦. 倪文僖集[M]//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43册. 合肥:黄山书社,2013.
- [35] 稽璜,曹仁虎. 钦定续文献通考[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29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36] 明宪宗实录[M].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37] 朱国祯. 涌幢小品[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 [38] 南炳文,吴彦玲. 辑校万历起居注:第1册[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336.
- [39] 王祖嫡. 师竹堂集[M]//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87册. 合肥:黄山书社,2013.
- [40] 申时行. 赐闲堂集[M]//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68册. 合肥:黄山书社,2013.
- [41] 胡新生. 礼制的特性和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J]. 文史哲,2014(3):66-78.
- [42] 陈仁锡. 皇明世法录[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5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43] 丸桥充拓. 唐宋变革期的军礼与秩序[G]//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 夏炎,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2-209.
- [44]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6.

The rite of marital: research on the Large-scale military parade of the Ming Dynasty

MA Ji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military parade is a military etiquette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emperors to exercise and review the army, occupying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national politics and military lif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specific temporal and spatial backgrounds, examining the Ming Dynasty's Large-scale military parade and clarifying the Mi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Large-scale military parade", and based on this, re-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m, text, and practice of the Ming Dynasty's Large-scale military parade, and the rol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arge-scale military parade activity in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roces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text of military parad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lacking for a long time. Until the Longqing period, the ministers of the court reviewed the ancient rituals and formulated them at the right time. In practice, in Hong Yong period, the parade activities were mainly held in the course of the war, and the military nature was prominent, but there was already a sense of "salut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Ren Xuan, there was a parade in peacetime, and its function was a kind of deterrence by force; during the period of Zheng-tong, Tianshun, and Chenghua, the military parade in the suburban Xiyuan developed, and the scale and grandness of the parade reduced. The functions are limited; In the three dynasties of Hongzhi, Zhengde and Jiajing, the military parade was stagnant for more than 90 years; during the Long Wan period, the military parade rose to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military parade was regarded as a military activity rather than a ceremonial ceremony, but the color of "saluting"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i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ninth year of Wanli (1581), the Ming court held the last military parade. The military parade was no longer held with the termination of the reform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Large-scale military parade; Ming ceremony Promotethemilitary; Deterrence by force

责任编辑 江娟丽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